

王元化 主编

海外
汉学
丛书

【美】欧大年 著

● 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B928.2

10

85993

王元化 主编

海外汉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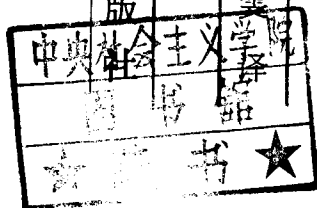
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

【美】欧大年 著

刘心勇 严耀中 邢丙彦 陆惟信 田金星 蒋小雯

周育民 刘昶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32213

DG14/24

沪新登字 109号

海外汉学丛书

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

〔美〕欧大年 著

刘心勇 严耀中 邢丙彦 陆惟信 田金星 蒋小雯 译

周育民 刘昶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百科排版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09,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5-1369-6

B·191 定价: 6.50 元

献给埃丝苔拉、丽贝卡和马克

DG 14/24

85394

中译本序言*

非常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周育民先生建议把我这本书译成中文,作为一个外国学者,我引为殊荣。希望这项工作可以促进中西研究者之间的交流。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明清两代中国确实存在着与其他文化中所存在着的类似的民间宗教教派。为了消病解灾、互相帮助和希望死后升天,人们加入了这些自愿的宗教组织。虽然这些组织中有些或曾参与反抗政府的武装起义,比如十九世纪初的八卦教,但大多数仍和平地处于民间。它们是由普通人所创立和领导的一种有组织的民间宗教形式。这些人通过这种组织形式而成为官府所认可的机构和书院以外的教师和领袖。某些教派拥有自己的经书,称之为“宝卷”,而在中国,读书和教书向来是一种特殊社会地位的象征。民间教派对入教妇女一视同仁,有的妇女甚至成为教师和教首。由于上述的和其他的各种原因,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民间教派会蔓延滋生。

-
- 本序言惠蒙我的本系同事陈旭都先生译为中文,谨此志谢。
——作者

但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官方对于私结会社,尤其是那些具有与官府信仰相异的社团向来疑忌重重,视为非法。这种态度促成了士大夫及官吏对于民间宗教教派的敌视;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尽管官吏们自己也承认未见有危害行为的证据,也照例把这些教派当作异端和图谋颠覆的组织。当然,这种敌视态度部分地也是由于官僚士绅对于下层的普通民众及其文化的蔑视所致。

本书第三章谈到,十九、二十世纪曾有若干学者对民间教派持有较为积极的观点。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些教派在民间历久不衰、持续扩展,本书试图重新估价有关教派团体的资料。

这本著作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若让我今天再来下笔,可能就没有这个勇气了,实在是恐怕错误太多。然而,本书出版以后,中国、日本、美国和我自己的研究,都证实了本书的基本论点。在美国,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即要了解一种文明,必须首先懂得该文明中普通民众的生活、活动和信仰——一定程度上激起了研究中国民众文化和宗教的兴趣。在这一点上,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较之久已强调民间文化重要性的研究早期近代欧洲的学者,仍然是落伍的。

我在本书第三章中指出,对于宗教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应了解人们的信仰和行为,而不是维护或批判他们的信仰。不论我们各自的观点怎样,宗教在事实上是一种具有极为重大历史意义的人类文化的产物,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正因为平民百姓并不是哲学家,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可谓凤毛麟角,所以像宝卷这类东西对于了解他们的思想就特别宝贵了。

我为本书所作的研究工作,最后一部分完成于1974年,

以后我又得到了不少新的收获。这里，把一些需要修正和读者留意的问题列举如下。

首先，近年来我使用的术语是“民间宗教教派”，而不是“民间佛教教派”。佛教对于这些团体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其他传统势力，尤其是道教的影响也并不逊色。十六世纪前期的罗教无疑是民间佛教的一个支派，但当时的金丹道，正如其道教色彩的名称所示，并不是佛教教派。这些团体的特色在于其组织形式，而不在于特殊的信仰，所以，“民间宗教教派”这一术语更为广泛而适用。

尽管明清两代的民间教派自奉是给处于世道变乱、道德沦丧的末世中的人民带来希望的崭新的宗教，其实这种想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东汉魏晋时代，道教徒以宣扬新宗教自居，以为他们的新宗教比巫师和占卜者的仪式来得优越。四世纪时道教的上清派诫谕人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只有上清道士与道徒方可幸免于难，并在新世界中做官、传教。五、六世纪，一些中国的佛教徒也以为世人既如此自私堕落，故洪水、大火、瘟疫不久将会把所有的人毁灭殆尽，仅有极少数人可因佛解救而幸免。这些和尚著书写经，劝诫世人礼忏、信佛、行善、诵念经咒，以求普渡众生。有些经书的语言与明清宝卷如出一辙。有趣的是，五世纪的有些经书对佛教僧尼也有所谴责，并强调凡夫俗子也可成佛；某些宝卷也是依样画葫芦。这些早期的经书曾遭某些佛学家的非议，斥为伪经，理由是它们成书于中国。其中不少被摒弃于公认的正统经籍之外，以至在二十世纪初年敦煌石窟发现以前，一直被认为早已佚失了。这些经书与宝卷的相似之处，使我们意识到某些民间宗教有着何等悠久的历史。

其次,阅读本书时应注意的还有以下几点。第五章中应注意,道教徒也在清晨礼拜太阳并吸取阳光,可见教派的太阳礼拜不仅是摩尼教的影响,也受了道教的影响。“明王”的称号也见于早期佛教典籍,所以这个称号未必只是摩尼教影响的结果。1981年我曾撰写了一篇论文,较详细地介绍了白莲宗创始人茅子元的生平,阐明他是净土宗的祖师之一;追随他的一些信徒创立了一个世俗教派,教徒可以结婚,并且奉行道教的仪式。到元代,正统的净土宗教长使官方确认这个世俗教派为异端,并应予禁止。

第五章的其余部分作为一个历史简述仍然是有用的,不过,如果有志于深入探讨的话,应参考新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日本野口铁郎教授以及美国韩书瑞女士和石汉椿先生的研究成果。我自己也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台湾民间宗教教派的专著(与一位人类学家合著)*,其中有两章是讨论一贯道的。

至于第六章,在本书出版后,我曾撰写了更详细讨论白云宗与罗教的论文。根据新近的研究,罗清本人显然不是守卫运河漕船的兵士,而他后来的信徒中确有漕船的卫卒。罗曾一度在河北当戍卒,成年以后长期在河北与山东传教。他的生卒年为1442—1527年,已在第六章的注解中写明了。他是十六世纪中最重要的民间宗教的教士。

撰写本书时,我尚未看到很多宝卷,主要利用了第三章中提到的十九世纪河北的一个知县黄育楹的著作。然而,1981

* David K. Jordan and Daniel L. Overmyer: *The Flying Phoenix—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 (《飞鸾——台湾中国教派宗教的样式》)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译者

年我到中国，从公私藏书中看到了许多宝卷。研究结果发现，这位黄先生以为无生老母故事的出现远在罗清之后，实在是搞错了。事实上罗清曾提及“无生父母”（这是无生老母的别名）；我在中国还找到了一本关于这位救世娘娘故事的书，出版于 1523 年及 1543 年。

第八章中我对宝卷和变文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是根据中国在这方面较早的研究。近来的研究对变文系由话本演变而来、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的论说，已提出疑问。这种论说至今尚未获得确实的论据。我们所知道的教派宝卷大约出现于 1500 年间，距变文绝迹达数百年之久。罗清所写的宝卷引用了他读过的一些前代的书，全是佛经或诸如《观世音菩萨本行经》（后称之为《香山宝卷》）之类的大众化的佛教教义，其中没有变文。至于其他的早期宝卷，则较多道教色彩，可见也不会与变文有直接的关系。

第四章与第九章中，我讨论了宗教教派和所谓的“秘密结社”（如天地会）的区别。我较新近的研究还阐明了这两种民间自愿的结社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根源：民间宗教教派是由宋元佛教和道教产生出来；天地会则是由十八世纪后期台湾乡村中互助自卫性的结社中发展而来，起初完全不是一种秘密结社，也不反清，只是一种结拜兄弟会。我其实已经不用“秘密会社”这个术语了；我以为“结拜兄弟会”这个术语更为正确。

总之，本书中有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但其主要的论点依然成立。我在 1981 年看到的宝卷更证实了这些教派本质上是宗教性的组织。我希望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会促使其他学者在这一领域作更多的研究，以便使我们对明清两代普通民

众的希望和他们的价值观念有更深的了解。

欧大年

(Daniel L. Overmyer)

(加拿大比西省立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兼主任)

1986 年 8 月

序 言

至元四年(1338年)，……袁州妖僧彭莹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反。反者背心皆书“佛”字，以为能有佛字刀兵不能伤人，皆惑之，从者五千人。郡兵讨平之，杀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莹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

初，莹玉本南泉山慈化寺东村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逾六十岁，善观气色。一夕夜雪，见寺东约二十里红焰半天。翌日，召其庄老询之，曰：“汝村中得无失火乎？抑有他异事乎？”内有一老曰：“村中无事，唯舍下媳妇生一儿子。”僧喜曰：“盍与我为徒弟，可乎？”老者遂舍为僧。……

其子年十岁始入寺，与群徒嬉时预言祸福皆验。年十五，南泉山下忽产一泉，甚冽。是时民皆患疾疫，莹玉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败逃淮西，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①。

这段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民间佛教流派中那个充满生气和神秘莫测的世界。这些教派有的像周子旺、彭莹玉那样揭竿而起，有的则安分守己。已经有人从社会史和政治史的

角度对这些民间教派作了若干考察,但对于这些教派的宗教信仰及其仪式,还需要进一步认真加以探讨,本书的主旨即在于此。

权衡关于彭莹玉的描写为研究这类团体既提供了可能性,也反映了这类文献记载中的诸多问题,因为权衡承认彭是个奇理斯玛式的人物*,但他所侧重的只是这次起义本身,而不是其组织和信仰的细节。除了少数的例外,有关这些异端运动的记载均出自官员和文人之手。尽管这些教派一般都有自己的经卷和仪式,不过一旦被官府发现,即遭销毁或禁绝。有关公开造反的资料虽然俯拾皆是,然而正如李世瑜所说^②,对这类教派有兴趣的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像考古学家一样,力求对涉及有关内容、时代和他处的相同现象的零散资料作出分析和解释。比如,若想对彭莹玉的教派作进一步研究,就必须了解中国佛教和道教中符咒和医术的作用,必须懂得干支轮转被视为改朝换代的机会这一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后一直为民众运动沿用的观念。资料尽管分散,不过还是足以揭示这类教派的组织结构和神话内容,并帮助我们从中部,从那些虔诚的信徒方面去更好地了解民间教派的活动。

这份关于1338年江西起义的材料还颇令人困惑不解。很显然,由于彭莹玉能卜会算、妙手回春,而在那里赢得了大批信徒,但彭、周自己又是如何想的呢?他们是否真的相信自己负有建立新秩序的天降之大任,或者仅仅是要弄欺骗手段,哗

* 奇理斯玛(Charisma)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使用的术语,指令人敬畏的、近乎神奇的力量和能力,具有这种非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拥有一大批狂热的信徒。这种非凡人物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政治的、世俗的。——译者

众取宠,以达到更为自私的目的呢?抑或两种动机兼而有之?对此,各种解释纷纭不一。依我之见,首先必须按照本来面目将动机与民间教派的信仰内容及其演变情况结合起来作一番认真的探讨。确实,我们不可能洞悉每一个教首真正的内心动机,不过,既然我们明白这一问题悬而未决,需要社会与历史的更明晰的答案,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把有关信仰的陈述视为一部分参予者的真实意图。

教派的宗教活动尽管在明代(1368—1644年)的最后几十年达到了高潮,我感到还是有必要对它们的早期渊源作一番探讨,这样才能显示它们在中国宗教史上的地位。我也尝试结合欧洲和日本的类似现象进行跨文化的考察。所有这些,对于我的主要研究课题即探讨信仰与仪式的类型,都是很有必要的。

芝加哥大学北川三夫(Joseph Kitagawa)和孔飞力(Philip Kuhn)鼓励我承担这一课题;新加坡南洋大学戴玄之帮助我找到了在台湾的一些重要资料;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台北主办的中国语文联合研习所蔡懋棠最初协助我翻译;宾夕法尼亚大学韩书瑞(Susan Naquin)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对从事中国民间教派和反叛研究的诸位学者,尤其是迪格鲁特(J.J.M. DeGroot)、杨庆堃、朱永德、重松俊章、冢本善隆、铃木中正等,我同样深怀感激和钦佩之情,他们的著作启发了我,使我有可能是着手这项研究。^①我还要感谢比西大学亚洲研究图书馆谢瑞琰为我提供了出版信息和若干没有登录的资料;奥柏林学院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我撰写本书提供了基金。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

意见。当然,如果没有我的妻子埃丝苔拉(Estella)的理解和支持,完成这项工作将会困难得多。我感谢她和我的孩子丽贝卡(Rebecca)、马克(Mark),谢谢他们的耐心,对他们来说,这本书意味着多少次家人团聚机会的耽搁。

注释:

① 权衡(1340—1370):《庚申外史》(1369),上海1922年版,第5—6页。袁州,今江西宜春县。彭莹玉北奔湖北麻城之后,于1351年再次发动起义,其时,元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元史》三十九卷也提及1338年的起义:“袁州民周子旺反,僭称周王,伪改年号。”

② 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成都,1948年版,第2页。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1
序言	1
第一章 导言：问题以及考察	1
第二章 长生教：一个恰当的例证	8
第三章 解释的历史：造反者，传教者，或二者兼之	13
第四章 跨文化考察	61
第五章 白莲教教义历史概述	92
第六章 其他团体：白云教和罗教概述	131
第七章 民间佛教的样式：信仰与神话	153
第八章 民间佛教的样式：教主，经文，仪式	191
第九章 结论	229
征引书目	243
译后记	285

第一章

导言：问题以及考察

宣称普渡众生的民间教派存在于许多文化中。其教主自称秉承天意，倡导以地方语言布道，简化仪式、经文以及集会组织制度，从而形成了各个民间教派的独特风貌。最著名的民间教派运动就是十三世纪日本的净土宗*，十六世纪欧洲的路德宗*和中世纪印度教中的守贞专奉派*。在历史上的中国，同样出现过类似团体。

一些学者早已承认在中国存在民间宗教教派，但往往将它们与某些自愿结社如秘密会社以及不时爆发的农民起义等混为一谈。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民间各种结社进行更为准确

-
- * 日本净土宗由法然创立。1224 年其弟子亲鸾创立净土真宗，允许僧侣娶妻食荤，主张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得救，后分为十派。——译者
 - * 路德宗是由德国马丁·路德于十六世纪初所创立的基督教新教支派，用圣经的权威否认罗马教廷拥有的教义解释权、解救权和裁判权等各种权威，主张皈依基督即可得救，废除教阶制和繁文缛节，建立廉俭教会。——译者
 - * 守贞专奉派是印度教内部的虔修运动，主张专奉毗湿奴，尤其是毗湿奴的两个化身罗摩和黑天，不论性别、阶级或种姓，人人都可解脱。——译者

的分类,不仅应注意其政治功能,而且应该重视其内部的历史和宗旨。在此前提下,还应根据源流、教义和实践把各种不同的宗教运动形式区分开来。教派起源与“大传统”(“Great Traditions”)的关系与非教派的民间宗教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中国,道教、佛教和摩尼教都曾在民间发展了大众化的教派,它们互相渗透,并受到了儒家学说和地方习俗的影响。我将探讨的是那些显然主要是受到大乘佛教影响的教派运动。大乘佛教特别强调的是通过大慈大悲的菩萨来普渡众生。我作此选择既是出于个人的兴趣,也是限定叙述范围的需要,当然这并不否认其他的教义或其影响。佛教徒开始组成脱离寺院的团体,最早出现于五世纪初期的北魏,文献称这种团体的领袖是“谋反沙门”。从那时起一直到二十世纪,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我们不断可以看到这类团体的踪影。我主要研究的是这类具有较大影响的运动,如弥勒教、白莲教、白云教和罗教或无为教等^①。除了研究这些团体所持的主张和对解决救世问题的抉择之外,我还将考察这些团体在中国宗教史上的地位及其与社会和政治的密切关系。

如果撇开教派本身的信仰和活动,那么,它们与正统佛教僧团(Sangha)的关系、它们的虔诚信仰为何常常相伴着军事政治行动,可能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了。这两个问题都过于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关于民间教派与佛教僧团的关系,首先必须指出,教派是世俗的、异端的、调和各种信仰的。白莲教显然发源于净土宗,但不久即改弦易辙,进行诸如教长结婚、教义更新、教权世袭等等的改革。不到二百年,道教的天尊神仙、道门科仪也步入堂奥。到1351年时,白莲教系统的各民间教